



研究論文

剪纸研究

沈之瑜 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817

128



372581

剪裁研究

沈之璋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長樂路六七二弄三三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二號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上海市印刷五厂、新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25 印张 1 7/25 插页 22 字数 15,000

一九六二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六二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统一书号 8081·5089

定价 七角六分

目 录

一、剪纸探源·····	1
二、我国民间剪纸与古代风俗的关系·····	9
三、中国民间剪纸的风格、题材和技法·····	13
四、剪纸的特点·····	26

一、 剪 紙 探 源

“剪纸”、“刻纸”，虽然名称不同，但两者都是以纸为艺术加工的对象，运用不同的工具，同样达到造型目的的一种民间艺术。它充分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艺术才能与美化生活的愿望。

近几年来各地出版了许多“剪纸”、“刻纸”等集子，有的是某一个人的作品的选集；有的是某一地区里的优秀作品的汇编。它们都是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政策灌溉下开放出来的美丽花朵。这些集子的出版对于促进这一民间艺术的发展以及研究各地作品的风格都有很大的帮助。

遗憾的是关于剪纸、刻纸的介绍性文章中很少提到它的源流演变，因而对于研究这一民间艺术的历史传统便缺乏材料。诚然这一民间艺术的史料不多，研究者少，是原因之一，但我认为主要的还是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有毛病。

一种毛病是刻“纸”求“剪”，以为既称剪纸、刻纸，总得确是在“纸”上剪、刻出形象来的资料，才算是剪纸的史料。所以纵有提到它的历史材料的，大家引来引去也老是这么一段：

俞曲园《茶香室丛钞》记剪字云：“国朝吴仰贤《小菴庵诗话》云：‘杨诚斋诗集中有《赠剪字道人诗》，序云：‘道人取义山《经年别远公诗》用青纸剪字作米元章字体，逼真。’此按

至今流传，用泥金纸剪成，兼及花草翎毛，粘于黑色油纸扇，俨如挥写而成，知其所由来远矣。’周密《志雅堂杂钞》云：‘旧都天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又中原有余承之者，每剪诸家书字，皆专门。其后有少年，能于衣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更精工。’又考严州《建德县志》，林文耀字綢斋，幼即工书，中年失明，乃剪纸为字，势飞动若龙蛇，点画不差毫发，室人装璜成轴，易薪米以自给，人称之为曰林剪’。”^①

此外从没有提到其它史料了。

要寻找剪纸的史料，探究它的源流，我认为首先我们应该了解“纸”的概念在我国古时的那种混乱情况。

例如说：“用縑帛者谓之纸”^②、“古之纸，即縑帛”^③、“汉初已有幡纸”^④，以及所谓古之縑帛即为幡纸^⑤。①又如，在《东坡先生志林》卷七中载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仆责居黄州，郑元與君乘亦官于黄。一日，以此纸□轴求仆字，云：‘有故人孟访者，酷好君书，嘱我为求之。’……后数日，适会中秋，仆与客饮酒江亭上，醉甚。乃为此数字，

① 华夏图书出版印刷公司印行徐蔚南编《剪画选胜》序言、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美术工艺》一三六页、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民间窗花》叙记等，均引的这一段。

② 范曄《后汉书》七八“蔡伦传”。

③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

④ 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

⑤ 王隐《晋书》：“古之素帛，依书长短，随事裁制，枚数重沓，即名幡纸”——宋槧《太平御览》六〇五引——《初学记》二十一文部：“古者以縑帛，依书长短，随事裁之，名曰幡纸。”又宋董道《广川书跋》卷十，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八。

① 《考古学报》第八期，王明著《蔡伦与中国造纸术的发明》。

时元丰四年也。明日视之，纸乃绢也。然古者本为绢纸，近世失之。”

縑帛或绢都是丝织品。我国古代制造纸的原料和绢帛等同样都是取之于蚕丝的。《说文》云：“纸、絮一箔也。从系氏声。”据《急就篇》注：“渍茧擘之，精者为绵，粗者为絮”，又据段玉裁注解“箔”字的意义是“在水中击絮”的意思。由此可知我国古代纸的制造，是从蚕丝衍化出来的。而在实际效用，绢、帛与纸其对于书法、绘画来说，它们的功用都可通用的，这也许是过去纸与丝织品在概念上混淆不清的原因。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在研究方法上不能刻“纸”求“剪”。任何一种艺术，其原始雏形决不会和它目前的面目完全相同，其中一定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

我们且看顾嗣立注《温飞卿诗集》中“咏春幡”一诗中有“……剪綵为小幡”之句；而《酉阳杂俎》则载“剪纸为小幡”，可见同样都记载唐代立春的风俗，却有“纸幡”、“綵幡”之别，足证两者不仅在概念上可能有等同的混乱，而且也还有相延发展的可能或同时并存的事实存在。

另一种研究方法上的毛病是主观臆测。如阿英同志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民间窗花》一书的叙记中说：

“‘剪纸’的历史，实际上是很远的。但究竟远到什么时候，只有依靠推断来决定。可以想象，剪纸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织绣的需要，就是织绣人物、花卉及自然景物时，常常要先有花样。小件是剪成的居多，这从后来使用花样的方法上，可以推断得出来。”

很显然的，剪纸的功用不限于织绣一种。我们不能根据今日剪纸

的某一种功能加以“推断”古代剪纸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这种“推断”、“想象”的研究方法，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还是割断了它与民间风俗密切关联的这一特点的。

考察今日剪纸的最普遍的用途如窗花、喜花、龙灯花、香斗花……等等都与现存的风俗节日有关，这对于我们研究它的源流大有启发。

《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綵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置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又云：“立春日，悉剪綵为燕以戴之，贴宜春二字。”据此，可知华胜之为用有二，一以金箔镂成，人日贴屏风；一剪綵为之，置于头鬓。李商隐人日诗有“镂金作胜传荆俗，剪綵为人起晋风”之句，正是吟的此种风尚。据传说“剪綵为人”这种风尚起自晋代贾充之妻李夫人^①，但这不一定可靠，因为创立一种风俗习惯与改变一种风俗习惯有同等的艰巨，决不会随某一个人的好恶而兴废，但据《荆楚岁时记》来看，我国古代确有这种风气实是无可怀疑的^②。

那末以金箔镂成的华胜是否这一民间艺术的滥觞呢？

我们虽然因为资料不足，还不能说今日的剪纸一定是古代的华胜演变而来的，但是古之华胜确实具有今日剪纸的传统作风也是无可怀疑的。今日日本正仓院里还保存着两张我国唐朝至德年（公元756—757）的人形华胜的残片。且看《正仓院考古记》的记载：

① 见《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事、“岁华纪丽”八日镂人、《古今事物考》卷一。

② 《荆楚岁时记》的撰者宗懔过去认为是晋代人，故旧本岁时记题为晋人，但据南史梁元帝本纪知道懔实系梁时楚人，其所述乃本土俗，所以至少他反映的是梁时风俗可以确信无疑的。

“据齐衡三年（公元856）〈杂财物实录〉^①称：‘人胜二枚，一枚有金箔字十六，一枚押彩绘形等，边缘有薄裁物，纳斑茵箱一合，天平宝字元年（公元757）閏八月二十四日献物。’今品则以二残片粘合为一者。一片系于浅碧罗之上，粘有金箔剪成十六字云：‘令节佳辰，福庆惟新，变（当为嬖字之譌）和万载，寿保千春。’〈杂财物实录〉所称有金箔字者即此，今金箔诸字已变黝黑，罗色亦暗矣。又一片较大约四分之三，粘于其下，边缘图案以金箔剪成，上粘红绿罗之花叶，缘内左下端有彩绘剪成之竹林，一小儿戏犬其下，金箔边缘及彩绘人物，色彩如新，惟犬已残耳，此当〈实录〉后称之物。”^②

根据这一段记载，结合实物图录（参看插图一）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二点认识：

一、以金箔剪成图案，并以红绿罗衬为花叶的这种作风和今日广东省饶平、佛山等县的剪纸非常类似（参看插图二），所不同的仅是材料上古之金箔现已改为金纸；古之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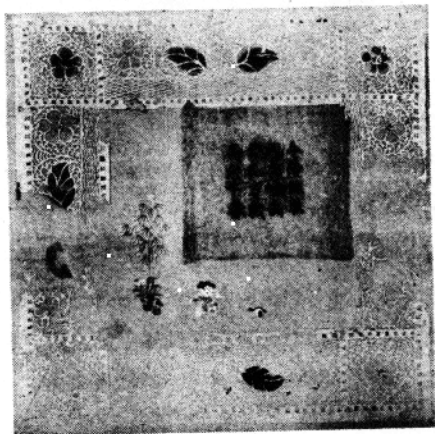


图1 “华胜”残片

唐至德年

① 《正仓院御物棚别目录引》。

② 傅芸子著《正仓院考古记》四六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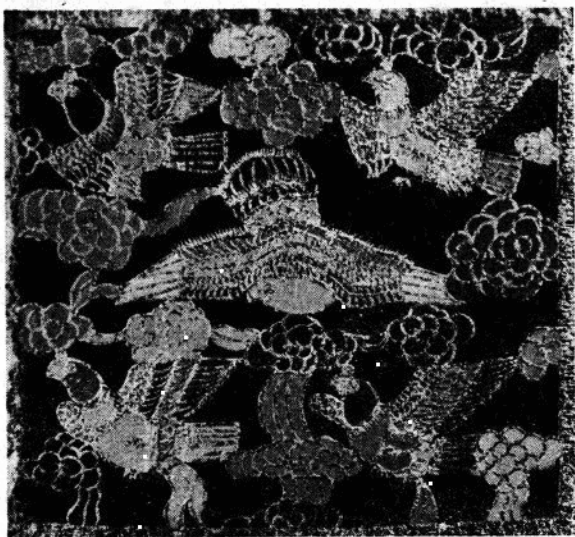


图2 云 鹤 广东饶平

绿罗今已改红绿纸罢了，实质上正是它普及化了的证明。

二、日本天平宝字元年，正是我国唐代至德二年。既有这种东西流入日本，可见当时我国还盛行着这种“荆俗”“晋风”。这在其它唐、宋时代的记载中可以窥见其盛况的一斑。例如唐孙思邈撰《千金月令》载：“唐制，立春赐三省官，綵胜各有差。”唐段成式撰《酉阳杂俎》载：“立春日，士大夫之家，剪纸为小幡，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又剪春蝶、春钱、春胜以戏之。”宋高承撰《事物纪原》载：“唐中宗景龙中（公元707—709），立春日出剪綵花。又四年正月八日立春，令侍臣迎春，内出綵花，人赐一枚。”

事实上，这种荆楚遗风，不但在唐代还盛行，而且宋代也还保存着。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

“立春日，自郎官御史寺监长貳以上皆赐春幡胜，以罗为之，宰执亲王近臣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置归私第。又士大夫家剪綵为小幡，谓之春幡，或悬于家人之头，或缀于花枝之下，或剪春蝶、春钱、春胜以为戏。东坡立春日亦簪幡胜过，不由诸子姪笑指云：‘伯伯老人亦簪幡胜邪。’”

宋庞元英撰《文昌杂录》云：

“初十日立春，赐三省官綵胜各有差，谢于紫宸殿门。杜台卿谓：‘正月七日为人日，家家剪彩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置之头鬓。’今世多刻为华胜象瑞图，金胜之形，引《释名》，‘华’象草木华也，‘胜’言人形容止等一人著之则胜，又引贾充李夫人《典诫》曰：‘每见时人月旦花胜交相遗，与谓正月旦也。’今俗立春日亦近之，然公卿家尤重此日，莫不镂金刻缯，加饰珠翠，或以金银穷极工巧交相遗问焉。”

由于“公卿之家”“莫不镂金刻缯，加饰珠翠，或以金银穷极工巧”，故华胜之制自宋以后在统治阶层中便逐渐失去“迎春”的原来意义了。

但毕竟是“镂金作胜”、“剪綵为人”的艺术活动是与民间风俗习惯密切结合着的，它不仅提供了由“镂金”、“剪綵”而发展为“剪纸”的一个巨大的可能性，而且突破了立春迎春的遗意，在生活的各方面广泛起着美化的作用，这是促使这一民间艺术发展的社会基础，所以虽然它曾为贵族所享有，但终不能与民间隔绝，而必然为中国人民所

喜聞乐见，而且劳动人民自己还掌握了这一创作技巧运用到了如此成熟的境界：

“石女，张蔡公女也，有巧思，与人接谈，袖中细剪春花秋菊细草垂杨，罔不入神，其剪制香奁，绝巧夺目，得之者珍藏焉。”〈保定府志〉

由此可知今天研究和发扬剪纸这一民间艺术，我们绝对不能割断它的发展历史。

二、 我国民间剪纸与古代风俗的关系

中国的民间剪纸起源很早，流传很广。究其原因，主要是劳动人民自己掌握了剪纸的技巧，配合社会风俗满足了广大人民节日生活的需要。因此，人民的喜闻乐见和生活节日的需要便成为发展剪纸艺术的群众基础；而各种社会风尚又成为促进剪纸艺术发展的社会因素。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形成起来的各种社会风俗，一般的说，少不了沾上封建迷信的色彩。可是社会风俗的形成有各种原因，其中有许多风俗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在研究剪纸与风俗的关系的时候，必须以人民性为尺竿子，从中区别剪纸在各种社会风俗中所担任不同的仪饰作用，首先分辨它是迷信的还是健康的，从而从封建的外壳中剥出有益的或无害于今天人民心身的真实果实来。

我国古代的剪纸，遗存下来的极少。今天研究二者关系，只能一方面从现代剪纸的使用规律上结合文献来探索古代的风俗习尚；另一方面从记载各种风俗的文献中去求得对古代剪纸的内容、形式及其使用意义的了解。

今天有许多地区还流行着一种名叫“门綵”、“挂钱”的刻纸，它用红纸凿成“连钱”“卍”字等纹饰，并刻有祈福、增产等吉语。每当新岁贴于门额，过去人们迷信它具有“压胜”的作用。请看光绪年吴庆坻等修的《杭州府志》(七七卷风俗四)谓：

“琳宫梵宇，剪五色纸形如旗脚，贴于门额，上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语，在在有之，曰‘门綵’亦名‘斋牒’，彩笺五张为一堂，中凿连钱文，贴梁间以压胜，曰‘挂钱’。”

“门綵”、“斋牒”、“挂钱”名虽不同，实际就是一种东西，过去都认为有压胜的作用。今天各地利用这种形式，更换了字句内容，不仅‘压胜’的观念也随之消失，而且还起了积极的鼓励作用。不失为一种为人们熟悉的宣传形式。

从文献上看，古代剪纸的记载与“立春”这个节气的关系最密切。例如：

“唐制，立春赐三省官，綵胜各有差。”（唐孙思邈撰《千金月令》）

“立春日宴别殿内，出剪綵花，令学士赋之。”（《锦绣万花谷》唐中宗纪）

“初十日立春，赐三省官綵胜各有差，谢于紫宸殿门。”（宋庞元英撰《文昌杂录》）

“剪綵宜春胜，泥金祝寿幡。”（宋范成大立春贴门诗）

“缀条花剪綵，插户柳生烟。”（宋梅尧臣元日立春诗）

唐、宋时代立春时节的“春胜”、“綵胜”，实际上就是梁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所述正月初七日那天“剪綵为人，或镂金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的“华胜”。虽然日期不同，一个肯定在正月初七，一个改在立春，但“迎春”的意义并没有因此有所改变。

贴在屏风上的是用“綵”或“金薄”剪镂成的“人”形，戴在“头鬓”的决不是人形，而是“燕子”。《荆楚岁时记》载：“立春之日，悉剪綵为莺戴之，帖‘宜春’二字。”《锦绣万花谷别集》《荆公日记》载：“立春日，悉剪綵为燕子以戴之，故欧阳永叔云：‘不惊树里禽初变，共喜钗头燕已’

来。’郑毅夫云：‘汉殿斗簪双綵燕，并知春色上钗头。’”这些记载正是描写的此种风物。

大概到了宋、元以后，这种“簪燕”风气不在立春，又改在元旦了。这或许是立春这节气的时日不如元旦固定的缘故。

《帝京景物略》（明刘侗、于奕正撰）卷二“春场”中谓：

“唐制，立春日郎官御史长贰以上赐春罗幡胜，宰臣、亲王、近臣赐金银幡胜入贺，带归私第。民间剪綵为春幡簪首，今惟元旦日小民以鬃穿乌金纸画綵为闹蛾簪之。”

由此可见，这种风俗到了明代末年确已改在元旦簪戴了。至于所簪之“闹蛾”形象，王船山的《薑斋先生诗文集》与周祈的《名义考》各有不同的说法，前者谓：“以乌金纸剪为蛱蝶，朱粉点染。以小铜丝缠缀针上，旁施柏叶。迎春元日，冶游者插之巾帽。宋柳永词所谓闹蛾儿也，或亦谓之闹嚷嚷。”后者说：“北俗元日剪乌金纸，翩翩若飞翔之状，簪之谓之‘黑老婆’。按元日剪綵为燕戴之，曹松诗：‘綵燕表年春。’王沂公帖子：‘綵燕迎春入鬓飞。’燕为玄鸟，遗卵生契，故后人目为‘黑老婆’，即綵燕之遗也。”前后对照这二节记载可以看出，有两点是相同的：都说是在“元日”簪戴；都寓有“迎春”的古意。所不同者是“燕”还是“蛱蝶”各说不一。这一点，从这一风俗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应该同意后者的意见。但也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形象上的传说而“误燕为蝶”，或是如《梦华录》所谓“立春剪綵蛱、春燕为端”，确有“燕蝶并存”的事实，亦未可知。

立春除了戴“綵燕”之外，还有簪“春幡”的。

唐段成式谓：“立春日，士大夫之家剪纸为小幡，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又剪为春蝶、春钱、春胜以戏之。”（《酉阳杂俎》）宋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这种簪春幡的风俗，据清顾嗣立注温飞卿诗集之“詠春幡”一诗中认为是汉代立春日“立青幡，施土牛”的风俗衍化而来的。

总之，春来人间确是一件大事，从以上这许多材料来看，唐、宋之间不论在宫廷或民间这种风尚是盛极一时的。剪纸便成为这些节日里重要的“迎春”仪饰。

在封建的农业社会里，除了立春之外，平时人们为了庄稼的收获而祈求天时节顺的心情是很普遍的。据清赵翼撰的《陔余丛考》所载，我国元代初年在苏州一带曾经有过这样一种风俗：“吴俗久雨后，闺阁中有剪纸为女形，手持一带，悬簷下，以祈晴，谓之‘扫晴娘’。”元初李俊民有扫晴娘诗：“卷袖褰裳手持带，扫向阴空便手搖。”其形象可以想见。不消说这种风俗是带有迷信色彩的，但也代表了广大农民的一种争取丰产的愿望。

除了作为社会风俗的仪饰之外，终究剪纸它还具有抒发感情，美化生活的作用，所以一向被人们认为是一位姑娘勤劳而智慧的标志，自古以来诗人们常有歌颂。例如唐徐延寿人日剪綵诗谓：“闺妇执刀坐，自怜裁剪新，叶催情缀色，花寄手成春，帖燕留妆户，粘鸡待饷人，擎来问夫婿，何处不如真。”因为它有助于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所以在浙东“……永康、浦江等地农村，过去有一个风俗，妇女出嫁时，必须学会一手刺绣和剪纸，新娘子对刺绣、剪纸的手段越高明，男方越瞧得起，女的在夫家也越觉得体面，所以在这些地方，窗花就流行得很广了”。（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浙江民间剪纸集》前言）

剪纸既然获得了这样一个肥沃的土壤，当然便能在全国各地茂盛的生长流传了。

三、 中国民间剪纸的风格、题材和技法

剪纸是一种优美的民间艺术。它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深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因此，从南到北几乎处处风行流传，它象民歌一样，是我国各族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各族人民以自己卓越的才能剪成（或刻成）无数的作品，用来丰富和美化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的愿望。在党和毛主席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指导之下，它和其它艺术一样获得了新的生命，不仅反映了劳动人民强烈的爱憎，同时也发扬了剪纸艺术的优良传统。所以各地剪纸都能给人以健康、纯朴、清新的感觉和浓郁的装饰韵味。

由于地区不同，各族人民的审美趣味不同，全国各地的剪纸在大同中也有其小异之处。在风格上往往具有自己地区的特色。譬如，河北各地的剪纸善于“点色”，广东饶平、佛山等地的作品喜用金纸剪后衬以色纸，浙江乐清的擅长适应边饰图案，湖北沔阳、武汉的每多剪刻并施，刻线很细，如同白描一般。从总的风貌而论，西北的显得粗犷有力，而江南的则纤细秀丽。记得郭沫若同志曾对南北剪纸作过如下的评语：“曾见北国之窗花，其味天真而浑厚，今见南方之刻纸，玲珑剔透得未有，一剪之巧夺神功，美在民间永不朽。”^①这个评语是中肯的，

① 见徐南南编《剪纸选胜》题词，华夏图书出版印刷公司出版。